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他者的历史

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



[丹麦] 克斯汀·海斯翠普 (Kirsten Hastrup) / 编

贾士蘅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他者的历史

## 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

[丹麦] 克斯汀·海斯翠普 (Kirsten Hastrup) / 编  
贾士蘅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

[丹麦] 海斯翠普 (Hastrup, K.) 编; 贾士衡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ISBN 978-7-300-11997-7

I. ①他…

II. ①海… ②贾…

III. ①文化人类学-历史-研究

IV. ①C912.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1624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 他者的历史

——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

[丹麦] 克斯汀·海斯翠普 (Kirsten Hastrup) 编

贾士衡译

Tazhe de Lishi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0.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7 000	定 价	2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来有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她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不断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滋养、壮大和发展自己。当前，全球化使得人类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进一步加强，互动效应更为明显。以世界眼光和开放的视野，引介世界各国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成果，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历来注重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译介工作，所出版的“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等系列译丛受到社会广泛欢迎。这些译丛侧重于西方经典性教材；同时，我们又推出了这套“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系列，旨在译介国外当代学术名著。所谓“当代”，一般指近几十年发表的著作；所谓“名著”，是指这些著作在该领域产生巨大影响并被各类文献反复引用，成为研究者的必读著作。我们希望经过不断的筛选和积累，使这套丛书成为当代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成为读书人的精神殿堂。

由于本套丛书所选著作距今时日较短，未经历史的充分淘洗，加之判断标准见仁见智，以及选择视野的局限，这项工作肯定难以尽如人意。我们期待着海内外学界积极参与推荐，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深信，经过学界同仁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必将日臻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导 论 .....	克斯汀·海斯翠普	1
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调和 .....		3
研究的对象 .....		7
制作历史 .....		10
第一章 历史与欧洲以外的民族 .....	约翰·戴维斯	16
关于过去的思考方式 .....		19
身份认同和过去 .....		24
过去的影响 .....		28
第二章 在意大利南部制作历史 .....	托马斯·豪斯查德	32
第一个冬天：田野工作的矛盾 .....		33
第一个夏天：传奇、危机和循环 .....		35
第二个冬天：历史性的改变 .....		36
第二个夏天：想象与事实 .....		38
真实、论述和上帝 .....		42
第三章 欧洲文化中的异教遗存问题		
——异教徒的神祇是恶魔 .....	若教·德·裴纳-卡布若	51



现代人类学与对持续性的盲目 .....	53
长达十四个世纪的相似性 .....	56
固定性与重现 .....	59
迷信的未来 .....	62
结 论 .....	65
<b>第四章 了解政治事件的意义</b>	
——欧洲民族国家中的分支与政治 .....	麦可·赫兹飞 71
事件、分支与历史 .....	72
历史的负担：一个实际的例子 .....	75
谁拥有土地？国家论述中的教会与农民 .....	79
选举的旅鼠或社会的松鼠？ .....	84
结论：“谦恭的人将继承地球” .....	88
<b>第五章 二元历史：一个地中海问题 .....</b>	<b>安·克努森 92</b>
回顾现代性 .....	93
西地中海地区：二元历史 .....	96
司法正义与统治者 .....	97
由平等到权力 .....	99
结构上的不确定 .....	101
亲属关系的策略 .....	102
国王的子民 .....	103
超然的价值观：正义和国家 .....	105
二元历史的一致性 .....	107
<b>第六章 乌有时代与冰岛的两部</b>	
<b>历史（1400—1800） .....</b>	<b>克斯汀·海斯翠普 114</b>
时间和因果关系 .....	115
历史的背景 .....	117
社会：同时代的经验 .....	119
乌有时代：过去式的真实 .....	124
文化：反常 .....	127

第七章 “制作历史”的反思 .....	安唐·布洛克	134
编者简介 .....		142
撰文者简介 .....		143
人名索引 .....		145
主题索引 .....		148

# 导 论

克斯汀·海斯翠普

1990年，当我们选择历史制作（the making of history）作为在科英布拉（Coimbra）所举行的欧洲社会人类学家协会第一次会议中的一项议题时，我们是想在多年致力于使这门学科“历史化”并获致明显成功之后，清楚描绘出“历史学”在社会人类学中的地位。对于历史学与日俱增的了解，使人类学家对社会的时间和变迁投以较大的关注，这也意味着社会人类学对不同社会以不同的模式制作和思考历史一事，有越来越高的敏感度。比提（Beattie）曾经宣称：“他者的文化”（Other Cultures）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1964），在重新反思这些“他者的文化”之后，我们逐渐了解：“他者”（otherness）的范围，也包括数目庞大的个别历史（separate histories）。历史人类学这个领域，是这十年间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进行创造性交流的场所（Löfgren 1987），而这个领域的发现，已逐渐形成一种对明确的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再定义。

《他者的历史》是一组关于历史本质的反思，包括由他者历史的观点来质疑我们自己的历史概念。巧的是，本书大半的章节都是引用欧洲材料，适可彰显欧洲历史中固有的多元性。于是这种显然是以欧





洲为中心的想法，遂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结果，那就是打破了现代欧洲历史学所宣称的独一性（uniqueness）和一致性（unity）。

西方特有的历史意识，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假设社会变迁是相似的、持续的和直线性的意识方式（Lévi-Strauss 1966）。自从18世纪起，了解欧洲经验的独一性，一直就是社会哲学的中心关怀（Rowlands 1987: 63）。在人类学中，“他者”被排除于“我们的”历史之外，放置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里（Fabian 1983）。然而沃尔夫（Eric Wolf）曾经充分举例说明：虽然有些社会对时间有不同的概念，可是显然没有任何社会是在历史之外的（1982）。透过欧洲人的扩张政策，欧洲以外的民族和与其社会组织相当不同的民族，都被驱迫去参与一个共同世界的建构。然而就算是赞同应该说明他者系如何被牵扯进欧洲历史里的人，也可能迟迟无法接受“由欧洲的扩张所触发的全球化过程，也建构了他们的历史”（Wolf 1982: 385）。“他们”不应该只是因为被牵扯进我们的历史才被历史所承认；应该让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就像戴维斯（John Davis）在本书中所说的，自来一直有与欧洲无关的历史。

再者，如同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许多文章中看到的：认为欧洲历史具有独一性和一致性的观念必须予以破除。历史的一致感不仅毋宁是一种哲学推论而非社会实情，而且是高度知识化的启蒙传统的产物。欧洲和别处一样，拥有众多的历史。如果我们的文化意识已经被客体化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类别，亦即直线性和连续性的历史类别（cf. Sahlin 1985: 52），那么我们的分析研究便会揭露出社会经验的非共时性和不连续性。克努森（Anne Knudsen）对于科西嘉历史二元性的讨论便是一例。科西嘉人虽然确乎牵连在欧洲这个“较大的”进步历史中，但他们同时也生活在相当不同的历史空间里面。划定这个空间的不是（与“现代进步”相反的）“传统稳定性”，而是永恒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创造了其自身的暴力循环和令人头痛的历史。

即使在现代欧洲，我们也不能忽略历史的二元性或多样性。欧洲

社会的复杂性绝对创造不出均一的历史，它包含了好几种共存的历史。如裴纳-卡布若（João de Pina-Cabral）所证明的：征诸“异教遗存”（pagan survivals）这个违反我们统一进步观念的事例，我们的现代性概念实迫切需要进行修正。这个葡萄牙的研究说明的是：变得过时的是传播精英主义或文字历史的隐喻，而非历史的通俗诠释。豪斯查德（Thomas Hauschild）在《在意大利南部制作历史》一文中，<sup>3</sup>更进一步证实这一点。豪氏在田野工作中体验到，地方上的传统概念，如何在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促成古代仪式的复兴，但事实上却与真实的历史不怎么相关。据赫兹飞（Michael Herzfeld）的说法，“宗教传统与世俗现代性之间的分野，是推论的而非根据经验的”。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传统和改变是一体的两面，不是具有不同历史性的个别实体。

通常，当人类学家把他者的历史放在显著的地位时，具支配性的历史再现传统便会受到质疑，而欧洲的独一性也会被类别的模糊（blurring of genres）所取代。人类学对历史研究的贡献似乎正在于此：把世界史重写成一种非驯化的（non-domesticated）多元历史（cf. Harbsmeier 1989）。虽然人类学家在理论上倾向于强调有系统的而牺牲无系统的（Shweder 1984: 19-20），他们却仍然发掘出许多世界并非连贯的证据——虽然全球化的过程很明显——足以重写世界的历史。

## 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调和

如果欧洲的社会人类学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便是它对于社会结构的关注。最近，这种由涂尔干（Durkheim）传下来的遗产，也纳入了长时段（longue durée）与总体历史的结构。这使得吸收了人类学见解的历史理论，有了新的舞台。萨林斯（Sahlins）认为：历史学概念在人类学式的文化经验刺激下，出现了一种新爆发（1985：



72)。由于“历史理论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社会人类学”（Ardener 1989：22），而相对的，历史学家也始终不曾充分注意到社会的迹象和符号，也不曾关心连续而根本的社会功能（Braudel 1980：71），因此我们更能体会上述力量的重要性。

这种看似专业上的必然和排斥，却经常是制度所造成的意外结果。历史与社会科学间的分野当然不能用是不是合乎经验来解释；就这个层面而言，今日的历史学家一定已理解到“过去是一个外国”<sup>4</sup>（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Lowenthal 1985），而与早期历史留下的痕迹为伍的考古学家，也可以借由承认人工制品事实上是“行动的符号”而大幅延伸他的分析（Hodder 1982）。因此，经常被人提及的、认为历史关心“事实”而社会科学关心“理论”的说法（Jones 1976），已不再站得住脚。

社会人类学的本质在于处理“整体”（wholes）。自从发明了田野工作以来，整体就逐渐以某个地方文化的形式出现，构成一种“人类学的岛屿”（Hastrup 1990a；1990b）。这些岛屿主要都是从共时性（synchronic）的角度加以研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最初以这种新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都是没有文字记录的社会；一部分则是由于承袭涂尔干传统的社会人类学，其研究目的就是要以社会制度内在的功能连贯性来将其概念化。这个趋势大致是对于主导 19 世纪人文学科的历史潮流的反动；然而，不论其起因为何，其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 20 世纪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相当程度的疏离（Chapman *et al.* 1989：3）。甚至在有“历史记录”存在的地方，这些历史记录也往往遭到那些据说是受阻于“现代主义”（presentism）的社会人类学家的刻意忽视（Peel 1989：200）。不论我们是否接受这种标签，社会人类学最初的确倾向于忽略“改变是所有社会固有之特色”这个事实。而后，当社会变迁显然已成为无可忽视的事实时，他们又将现实一分为二：一边适用稳定理论，一边适用变迁理论（Chapman *et al.* 1989：4）。

结构和变迁的层级化体系（hierarchization），也遭到同样不幸的

对待。把稳定视为先天结构、把变迁视为偶发事件的概念，使早期人类学家致力追寻结构、整体和一致性这类“真实的”东西。研究社会变迁被视为第二流学者的工作：“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派我去研究社会变迁，因为他说我的人类学底子不够，不能做标准的田野工作。”（Mair 1969：8）这种社会结构研究与社会变迁研究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与下面这个看法有关，亦即真正的田野工作者是完全与他所研究的社会无关，而被低估的“应用人类学家”，不仅研究变迁，甚至还主动诱发研究对象的变迁。今天，我们知道：没有任何民族学家可以记录到完全未经任何污染的社会结构。“观察者永远是他或她所观察到的变化中的情景的关键部分。”（Leach 1989：39）由于受到近来民族学的微妙限制，我们今日对认识论的警觉，已迫使我们承认，根本没有可供视察的“传统”文化或社会。

近来有关特殊历史的研究，已充分说明结构与历史、稳定与变迁的划分完全是武断的（see e. g., Sahlins 1985; Hastrup 1985; 1990a; Knudsen 1989）。所有的历史都是植基于结构之中——偶发事实的系统化秩序。反过来说，这样的结构也只有通过历史事件才能显现出来（Sahlins 1985：144），借着把“起源不同的各种运动，节奏不同的各种运动：今天的时间来自昨天、前天以及所有以前的时间”聚合在一起，而串联古今（Braudel 1980：34）。

易言之，人类学家已经认识到：文化和历史是互相容受的（adjective）（Hastrup 1985：246），而不是实质上分离的两个实体。隐喻和真实合而为一，启动了社会（Sahlins 1981）。人类学岛屿的历史化，意味着稳定与变迁在理论上是可以调和的。虽然以前的人类学家往往将历史与变迁混为一谈，可是我们如今已逐渐能理解：稳定不比快速的变化更不具“历史性”（Sahlins 1985：144）。

也许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今日的联姻是一种愉快的结合，不过这两者之间也经过相当长的交往期，而且曾有过许多暂时性的挫折。早在1899年，法律史学家梅特兰（Maitland）就曾大胆地表示：“未来，人类学将在作为历史学或什么也不是之间，做一选择。”（1936



[1899]: 249) 他针对的目标是当时具支配势力的演化论范式 (evolutionist paradigm), 这个范式认为人类学应该仿效自然科学的模式。虽然这个范式终归崩解, 可是“原始社会”这幻想仍持续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塑形 (Kuper 1988)。梅特兰的这份宣言虽然猛烈, 可是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领域并未立即结合。就表面上看, 人类学选择做“什么也不是”。

然而, 这个“什么也不是”却产生了另一种非演化论的研究方法。有了田野工作作为其经验基础, 加上涂尔干的“规则”作为其理论基础, 社会人类学乃越来越关注作为一个本质上非时间性实体的社会的系统性。而这个情形又促使人类学与自然科学开始认真调情, 二者之间的感情, 在拉德克利夫-布朗 (Radcliffe-Brown) 宣称社会人类学旨在分离出社会的自然律时达到最高峰。埃文斯-普里查德 (Evans-Pritchard) 曾在 1950 年发表一篇著名陈述, 陈述中指出: 基本上, “社会人类学是一种历史编纂” (1964: 152), 这项声明就是针对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反动, 并企图重新将社会人类学归于人文科学。继埃文斯-普里查德之后, 学界立即完成由功能到意义的转移, 但这对于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关注并未造成任何严重的影响。杜蒙 (Dumont) 声称: “历史是社会借以揭示其本身面貌的运动。” (Evans-Pritchard 1964: 182) 但这项声称只不过重新引燃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的兴趣。至于埃文斯-普里查德本人, 在他声称人类学必然是一种历史编纂之后的讨论中, 曾含蓄地强调: 当我们在处理一个社会体系的发展时, “我们说的是不同时间点上的同一个社会呢? 还是 (两个) 不同的社会?” (Evans-Pritchard 1964: 181) 关键性的问题仍然是“社会”, 这反映了人类学对研究对象的新定义。

一直要到 1968 年《历史学与社会人类学》(*History and Social Anthropology*) 这本专刊问世之后, 历史学才开始引起人类学家的关注。虽然当时许多人类学家已经使用历史记录, 而且德国和美国的人类学传统也富有明显的历史性, 但最后将历史学引进英国人类学研究中的, 是路易斯 (Lewis 1968) 为社会人类学协会所写的这本专

刊。然而，这里的“历史”只是有限的过去感，而且主要是指历史记录。“而且”这个小连接词说明了这场游戏：两个科目之间并没有整合，有的只有因长时间观察所得到的对社会的附加资讯。在他的导论中，路易斯坚持：“历史学基本上仍然是一种看资料的方法，以及在特殊事情发生时询问和回答‘为什么’的方法。”(p. x)“时间因果律”(temporal causation)这个隐含的观念，在欧洲学术界有明确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原因”通常被认为是前例(antecedents)。如我在冰岛的研究中所指出的，这种因果律的看法基本上是非人类学的。

自此以后，社会人类学发展得非常迅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历史人类学”，最后终于使历史和社会科学这两个领域成功整合，我们不再需要用历史人类学一词，因为社会人类学已经整个历史化了。它的研究对象已经重新定义。

## 研究的对象

如上引埃文斯-普里查德的话所示，我们自来喜欢以空间说明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和文化，是在空间上彼此区隔的实体。相反的，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是时期或时代。真正的“历史”人类学必须同时兼顾空间和时间，这不仅是因为历史是社会在时间中的开展，也是因为“社会”是历史事件的制度形式(Sahlins 1985: xii)。社会与历史在人类学研究对象中的合并，说明这是“一种情状”(a state)，也就是在特定时空中的—一个情况。配合客观状况的是主观的真实——一个经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时间永远是“现在”定义的一部分。我们在田野工作中所进入的是这样的世界，我们同时发现它和界定它(Hastrup 1987a; 1987b)。

与早期对传统社会的看法相反，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宣称世界是稳定的或在结构上是一致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内，推论式的整



合有可能掩饰了实际上的分裂。譬如，潘恩（Robert Paine）近来就曾辩称：“在今日以色列所在的空间，以及今日以色列的犹太人中间，不只有一个‘时间’，也不只有一个‘地点’。”（Paine 1989：127-128）为了要理解“现代”历史的复杂性，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分裂（disjunction）的情形。赫兹飞在谈论希腊分支的那篇文章中，也曾举例说明：即使是一个一致的历史故事，也可以作为创造相反诠释的手段，而这些相反的诠释又在当地社会中维持了政治上的敌对。

“各个世界”（Worlds）可以被视为自我定义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透过社会惯习，特定的实体得以形成、繁衍或改变。“事件”所赖以登录和说明的，不是它们的客观属性，而是根据它们在一个特殊文化设计（scheme）中所具有的重要性（Sahlins 1985；Hastrup 1987b）。易言之，事件是有社会重要性的“事情”（happenings）。这是它们当初之所以被登录为事件的原因，也是它们和那些只不过是随随便便、不断持续发生的事情不一样的地方。这也表示：在外人眼中似乎对这个研究中的社会制度有某种重要性的特殊事情，在当地人眼中可能不够格称作事件。这种情形似乎正是造成16到18世纪冰岛社会瓦解的原因。如果对现实的关注是一种象征性的建构（Sahlins 1976：207），那么冰岛的证据便表示，对现实的关注可以建立在时代错置的象征设计上，而其结果是社会制度的崩溃。

我们在此必须注意，不要在象征或文化设计与物质情况间划上因果箭头。概念实存和物质实存不是互为因果，而是同时存在的（Ardenner 1982：6）。文化是一种行动和言说事件（speech events）的义涵面，对某一特定实存的诠释必须从与其同时存在的资源为起点，消除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习见的对立（p. 11）。

在这里的讨论中，这意味着一种区分论述与实存、“传统”与“历史”的问题。如潘恩所云：在叙述（或重述）身份认同这件事上，二者得以辐合。在设法通过传统的重建以提高犹太人的自我意识时，看上去“这种活动是设法使他们再变成‘他们从来也不曾是的样子’”（1989：131）。豪斯查德在目击南意大利的礼仪复兴时，也注意到这

—矛盾——他援引了谢克纳 (Schechner) 的行为重建概念 (1981)。“自我” (self) 这个意象把他们的想法运作进历史事件中，赫兹飞对于希腊世界的研究清楚例示了这一点。虽然所有的行动者在结构上似乎都同意一个统一的历史故事，可是他们对这个故事中的特定事件却有非常不一样的认知。政治立场和行动者本人的对应观念，使人们站在不同的立足点。这种生活于同一个世界的不同立足点的情形，可能不只是党派主义的结果，也是一种不同的权力游戏的结果，如裴纳-卡布若所示，教会在这个权力游戏中可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各个世界有其本身制作历史的模式，以及其本身思考历史的方法。任何历史的这两个方面都是密切交织的。戴维斯提醒我们：不可逆转的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偶发的社会和文化事实的结果。由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出“各个世界”是如何建立其本身的因果体系。因果体系以经验为根据 (Douglas 1975: 276)，而不同的经验会形成不同的因果。这么说不是否认某些客观的“因”的确在人类社会制造了某些客观的“果”。我们可以说，在所谓的“小冰河时代”，冰岛平均气温的小幅下降（这场气候惨况开始于 17 世纪末），可能曾在这个边缘的农业区域造成了多年的农业歉收。然而，它可能造成饥荒和痛苦一事，却不是不证自明的和客观真实的。要“解释”冰岛历史的走向，我们必须分析冰岛人的整体环境，包括阻止他们“适当”开发利用其贫瘠环境的文化源头。不但是各个世界都创造了它们自己的因果系统（以文化促成的经验为基础），而且这样的“因果系统”还会反过来影响事件的走向。

克努森对于科西嘉岛血仇制度的分析，也说明了这个重点。在科西嘉，男性荣誉感受到挑战被视为是杀戮的根本原因，而这种仇杀又借由在一个没有明确亲属关系的社会中被用来区隔盟友和敌人，而大大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因此，我们在界定历史化了的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时，必须要考虑到人们自己眼中的世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超越历史学家的“时间因果律”，而由真正人类学的观点讨论特定发展的原因。





## 制作历史

共时性层面上的事件登录也有其历时性（diachronic）层面的对应物。事件也根据其社会重要性的逻辑被记忆。和文化叙述一样，过去的故事也是事件真实结果的选择性记述，但这种选择并非毫无章法。

并非所有的事件都留存在记忆中。安唐·布洛克（Anton Blok）曾指出：对于任何主要是“历史性”的人类学来说，历史与记忆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记忆绝非机械性的。事件如果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或曾经被认为是重要的。这一点不像看上去那么理所当然，因为它不单纯是明显的值不值得记忆的问题。它是更为深刻的真理：历史的构成和记忆的选择都不是强迫性的追溯既往（Ardener 1989）。虽然在历史中所创造或记忆的宇宙与一系列连续的现在是相对应的，但值得记忆与否却是由共时性层面加以确认的。这表示当代事件的登录永远是追踪任何因瞬间性而被留在历史中的事件的基准线。因此，虽然人们永远是借着“将实存的独特性包覆于概念上的相似性”这个办法将现在植入过去（Sahlins 1985: 146），但他们却同时也传达出未来的“历史”。我们研究的目标，当然是共时性和贯时性的综合。

于是，相对值得记忆的，是从前（重）建构社会空间所留下来的痕迹。换句话说，在书写历史时对于事件的回顾式改写，可说是当代事件登录过程的延续。共时性面向和当代经验中的事件繁多或事件贫乏，与贯时性角度中的历史密度彼此相关（Ardener 1989; Hastrup 1989）。

这一点对于我们处理过去具有重要的暗示性作用，因为它将社会经验与大众对过去的记忆，恢复成历史书写的最重要因素。传统上，记录是历史唯一可以接受的证据，但是由人类学的角度